

典籍翻译研究

【主持人语】中华典籍的外译是跨文化对话与文明互鉴的关键桥梁。本期专题聚焦典籍翻译的前沿探索,汇集四篇视角独特的研究成果,展现了该领域的广度与深度。这些研究从不同维度展现了典籍翻译的挑战与可能。如何突破研究的固有范式?如何处理文本的残缺与文化的差异?如何在忠实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答案或许在于,将典籍翻译视为一项系统性的文化工程,既要深入挖掘其知识内涵与艺术价值,也要灵活运用多元策略与技术手段,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实现其价值的重构与再生。期待本期专题能为推动中国典籍的世界性传播贡献新的思路与力量。

《历史典籍〈左传〉英译研究的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一文反思了当前研究中存在的文本认知、研究技术与规则层面三重锁定的路径依赖问题,提出以“知识”为核心的路径突破策略,主张构建地方性知识认知体系、融合多元研究技术、建立双向互动的研究规则,旨在推动历史典籍英译研究走向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建构。

《敦煌变文英译补缺现象研究》一文系统分析了变文英译中的“文本补缺”现象,研究构建了“显性—隐性—非典型性”的文本缺陷分类框架,并对比了韦利与梅维恒两位学者在叙事性、逻辑性与文化性补缺策略上的差异,揭示了译者在处理残缺文本时所面临的忠实性与可读性的平衡难题。

《从话语镶嵌到传播突围》一文以《沧浪诗话》首个英语全译本为切入点,揭示了译者在学术话语霸权下的文化突围策略,指出该译本通过释义式路径与抵抗式策略,主动赋能异质性文化负载词,以调和性话语嵌入西方文论体系,实现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思想的创新性传播。

《汉学家的京剧英译典籍英译中的文学性与艺术性取舍》一文关注京剧典籍这一特殊文本,通过对比阿林顿、艾克顿与施高德的译本发现,汉学家译者普遍侧重对舞台视听元素的深度译介,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唱词的韵律与句式等文学特征,反映了戏曲翻译中文化信息传递的复杂性。

——华中科技大学 黄勤

历史典籍《左传》英译研究的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

黄勤 党梁隽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以《左传》英译研究为考察对象,通过系统梳理现有研究发现,当前该研究领域已形成文本认知锁定、研究技术锁定与单向研究规则锁定的三重路径依赖现象,三者相互嵌套制约,严重阻碍研究的创新发展与实践价值转化。有鉴于此,依托知识翻译学理论,提出《左传》英译研究路径的三大突破策略:一是构建以《左传》地方性知识为核心的认知拓展体系,重构译本的解读维度;二是推动以“知识”为引领的多元研究技术融合,革新研究范式与方法;三是建立以“知识”为逻辑起点的跨越式研究规则,形成“理论—实践—理论”的双向互动闭环,消解路径依赖的负面影响,推动《左传》英译研究进入良性循环,助力中国地方性知识的世界性建构和同类历史典籍英译研究。

关键词:《左传》英译研究;知识;认知拓展;技术发展;跨越式研究规则;路径突破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3-0121-11

DOI:10.26922/j.cnki.waiguoyuwen.2026.03.0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华人离散译者中国文化译介与传播研究”(20BYY017)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黄勤,女,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翻译研究、翻译家研究。

党梁隽,女,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典籍翻译研究。

引用格式:黄勤,党梁隽.历史典籍《左传》英译研究的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J].外国语文,2026(3):121-131.



本刊微信公众号

0 引言

中华历史典籍是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生活、共同信仰、共同语言和共同记忆的知识系统和思想源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性知识,也是世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福娟,2023:39)。典籍外译是中华文化传播的关键一环(罗选民等,2012:63)。然而,目前学界对历史典籍英译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且研究主要依靠单一的理论视角传统的研究方法,逐步形成了研究中的路径依赖现象,长此以往将会对相关研究产生负面影响。

《左传》作为中国首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是承载先秦地方性知识的典范典籍。本文以《左传》英译研究为切入点,系统梳理当前领域存在的路径依赖现象,尝试从知识翻译学视角探索路径突破策略,旨在助力典籍中地方性知识通过翻译转化为世界性知识,也为同类历史典籍英译研究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指引。

1 目前《左传》英译研究的路径依赖现象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源自生物学,由美国古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Gould)和艾尔德莱奇(Niles Eldredge)于1972年提出,用以说明偶然性随机因素对物种进化路径产生的影响。美国学者保罗(David Paul)于1985年将其作为正式学术概念纳入经济学领域。此后,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在对人类社会技术、经济、制度、文化等系统变迁的研究命题中先后引入并发展此概念,这一概念便逐渐成为西方历史社会学中的重要概念。路径依赖描述的是过去的选择对现在和将来所产生的影响,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会沿着该路径一直发展下去,并锁定在该路径上(时晓虹等,2014:54)。马奥尼(Mahoney,2000)认为,这种锁定状态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路径依赖现象并非偶发现象,而是广泛存在于各类社会行为中,亟需创新与突破的学术研究与探索也在其列。著名经济学家诺斯(North,1990)提出,路径依赖现象的核心在于认知层面、技术层面与规则层面的三重锁定(lock-in)。

国内学界的《左传》英译研究起步较晚,可追溯至2005年(王琨双,2005)。在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相关研究成果产出匮乏,累计仅40余篇文献,其中具备深度与影响力的高质量成果更是屈指可数。而且相较于文学、科技等其他文本类型,当前学界聚焦历史典籍翻译的研究本就稀缺(魏泓,2024:151)。因此,不仅《左传》英译研究存在明显滞后性,整个中国历史典籍英译研究领域均处于发展低效的状态。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与分析国内学界的《左传》英译现有研究发现,当前该领域的研究已呈现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具体表现为文本认知锁定、研究技术锁定与单向研究规则锁定。这三种锁定形式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叠加强化,且在各类影响因素的嵌套作用下,这

种路径依赖还将持续延续并不断加深(刘元春,1999:45)。因此,及时认识《左传》英译研究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探索突破之道,对推动该研究领域以及中国历史典籍的英译研究尤显重要。

1.1《左传》英译研究中的文本认知锁定

《左传》作为我国第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极具历史研究价值与文学价值,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深远影响。伴随着《左传》百年英译之路,西方学界也逐渐兴起“左学”。然而国内学界目前对于《左传》英译本的研究呈现出文本认知锁定,具体表现为研究对象认知锁定与研究内容认知锁定两方面。

1.1.1 研究对象认知锁定

在《左传》百余年英译历程中,涌现出多部英语全译本与节译本,构成了其跨语际传播的核心文本基础。其中,首部《左传》英译本(*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以下简称“理译本”)出自英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之手,收录于他编纂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中。此后,《左传》英译持续推进,1971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研究学会推出《晋文公——左传节选》(*History of Duke Wen of Chin. Excerpts of Tso Chuan*);198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出版美国汉学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英译的《〈左传〉:中国最古老的叙事史选篇》(*The Tso Chuan: Selections from China's Oldest Narrative History*,以下简称“华译本”),该译本选译了《左传》中的部分篇章。1996年,中国译者胡志挥的《左传》英语全译本(*Zuo's Commentary*,以下简称“胡译本”)纳入《大中华文库》工程,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2006年,李玉良编译的《〈左传〉名言》(以下简称“李译本”)由齐鲁书社出版。2016年,美国著名汉学家杜润德(Stephen Durrant)、旅美华人学者李惠仪(Wai-ye Li)与美国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史嘉柏(David Schaberg)合译的《左传》英语全译本(*Zuo Tradition / Zuozhuan: Commentary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以下简称“合译本”)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出版,成为当代《左传》英译的重要成果。

然而,当前国内学界的《左传》英译研究重心多集中于理译本,对胡译本、华译本的关注仅属偶见,且对2016年问世的合译本,相关研究尚处起步阶段。本研究以“左传+翻译”“左传+英译”“左传+译介”为核心检索词,分别设定主题、关键词、篇名、摘要等检索字段,在中国知网(CNKI)与万方数据库展开系统检索,数据统计显示,45篇有效研究文献中涉及理译本的达24篇,胡译本的有13篇,合译本的仅12篇,李译本的仅1篇。目前尚未发现有专门研究《左传》英译的专著。王广禄(2022)指出,翻译研究需立足宏观视野,把握翻译之“大者”与核心关键,方能实现研究与时代同步、论述顺乎发展大势。因此,《左传》英译研究不应再局限于传统译本,需紧跟时代步伐,将新译本纳入研究范畴,并且进行译本间

的多维度比较研究,探究《左传》原典所承载的先秦地方性知识在译本迭代中的重构、完善与拓展过程以及向世界性知识转化的路径。

1.1.2 研究内容认知锁定

《左传》的多元研究价值长期受到中外学界关注。西方汉学界对其价值的认知逐步深化。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首次在西方学界肯定《左传》的史学核心价值;1956年至1958年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举行的中日历史典籍讨论会承认了《左传》的史学价值,认为《左传》保存了大量古代史料,体现了中国史学思想的萌芽;以色列汉学家尤锐(Pines,1997)进一步论证其作为春秋思想史研究核心文献的可靠性。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史学理论兴起后,研究视角转向深层文本阐释:美国汉学家艾朗诺(Egan,1977)揭示《左传》叙事的主观建构性,强调其文学价值;李惠仪(2007)指出儒家核心思想贯穿于《左传》的文本阐释,凸显其哲学属性。

综上所述,《左传》涵盖史学、文学、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内容,具有史学性、文学性与哲学性等多重属性。然而,国内学界的《左传》英译研究焦点始终局限于译本对原典情节内容的传递是否准确(陈慕华,2006)。对《左传》所蕴含的史学叙事价值、儒家思想内涵、先秦文化特质等深层价值如何在译本中再现的挖掘严重不足,呈现出明显的认知锁定特征,难以充分彰显《左传》英译本的多元价值与跨文化传播意义。

1.2 研究技术锁定

与研究内容的局限相对应,当前《左传》英译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也深陷传统范式,缺乏量化研究与数字化技术应用。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文化元素与文学性的解读及翻译方法探讨,理论视角集中于文化传播理论(林琳,2012)、叙事学(陶源,2023)、翻译规范(曲婷,2019)等;研究方法以个案分析与描述性阐释为主(薛凌,2014)。技术应用局限于传统文本分析手段,未能借助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挖掘译本的语言规律、译者风格及跨文化传播效果等深层问题,严重制约了研究的高质量与规模化发展。

1.3 单向研究规则锁定

目前国内学界针对《左传》这类兼具史学价值、文学价值与哲学价值的历史典籍的英译研究多局限于单一维度的探索:或聚焦于个别译本的语言转换技巧;或单纯套用某一西方翻译理论进行文本解读。此类研究普遍存在两大缺陷:一是未能深度结合历史典籍独具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和哲学价值,导致研究脱离典籍翻译的本质属性,难以触及译本在历史语境重构与文化跨时空传播中的核心功能;二是缺乏跨学科的综合性理论研究视角,未能有效融合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传播学、哲学和比较文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使得研究视野受限,难以形成多维度与立体式的研究格局。此外,从研究闭环来看,多数《左传》英译研究始于对译本的碎片化分析,止于对既有理论的简单印证或浅层阐释,全程锁定

在“理论→文本”的单向探讨中,既缺乏对研究结论的综合性深化提炼,也未能推动研究成果向翻译实践指导、译本的优化与修订、跨文化传播应用等跨平台、跨领域场景的落地转化。这种“重理论阐释,轻实践反哺”的单向模式,不仅削弱了研究的实践价值,也使得理论本身难以通过实践实现迭代升级,制约了整个研究领域的发展活力。

综上所述,及时探寻打破以上三重锁定的有效研究路径,已成为推动《左传》英译研究突破瓶颈、走向高效发展的关键所在。

2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左传》英译研究路径突破

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逻辑使其难以自发打破,需要不在原有路径上的新变量引发内部变革并重构主导逻辑,才能实现路径突破(Fredin, 2016)。在翻译研究中,“知识”正是这样关键的新变量。杨枫(2021:2)提出,翻译本质上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与再传播的文化行为与社会实践,任何学科的知识积累都离不开翻译;蓝红军(2022:36)进一步阐述,翻译的本质便是知识行为。知识翻译学作为继承并超越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新范式(潘文国, 2023:9),以“知识的翻译”与“翻译的知识”为核心研究对象,涵盖与之相关的所有现象、行为、机制与规律(孟祥春, 2022:56)。其核心概念“知识”具有较高的理论解释力,能够为打破《左传》英译研究的三重锁定提供整体性的理论框架:以“知识”为核心来审视《左传》英译研究,可推动该领域的研究突破文本表层锁定,回归历史典籍的知识载体本质,结合其中的地方性知识开展认知拓展,进而催生多元化的研究对象、内容与技术手段。因此,以“知识”为统领,从认知、技术、规则三维度进行重构与创新,是实现《左传》英译研究路径突破的核心路径。

2.1 以“知识”为核心拓展文本认知

《左传》蕴含丰富的中国特色地方性知识,涵盖史学、文学、哲学等多个维度。当其英译研究的认知重心从文本情节转向“知识”本身时,便可突破对传统译本与表层内容的锁定,重新审视不同译本对三重维度地方性知识的呈现方式,实现研究对象与内容的系统性拓展。

从知识翻译学视角看,《左传》的文学性、史学性、哲学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春秋时期地方性知识体系的互嵌共生,不可割裂。以《郑伯克段于鄢》为例,原文讲述了郑庄公与其胞弟共叔段争夺郑国国君权力并于鄢城打败共叔段的故事,其蕴含三重知识维度。具体而言,其文学性体现为春秋笔法的含蓄反讽修辞(如降“郑庄公”为“郑伯”,以“段”而非“弟”去形容共叔段等方式进行反讽),哲学性则表现为对宗法礼制中“孝悌”伦理的推崇,史学性彰显出对权力争夺事件的系统性记录。不同译本对这三重知识的传递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如胡译本将其译为“The duke of Zheng overcame Shu Duan at Yan”(胡志挥, 1997:7),

选用英语世界更通行的“duke”来简化历史细节,优先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文化接受以及叙事的流畅性,但将三重维度压缩为单一史实,却导致了修辞内涵、伦理内核与制度语境的缺失;理译本将其译作“The earl of Ching overcame Twan in Yen”(Legge, 2011: 6),其中的“伯”严格对应于“earl”,并在后文将庄公译为“The duke”,虽展现出了原文中刻意降“公”为“伯”背后对郑庄公的史家道德评判意图,却缺乏了对共叔段不敬兄长、不尊君主的批判,对原文的伦理道德内核展现是不完整的;合译本(Durrant et al., 2016: 11)译为“The Liege of Zheng Overcame Duan at Yan”,选用“Liege”一词,超越了对原文中爵位的简单对应转化,强化的是封建权力关系中的君臣伦理,在词汇层面揭示原文春秋笔法下的伦理批判,并通过脚注强调该事件中庄公对于打败其弟的整体谋划,既让读者感知《左传》原文本的文学叙事策略,又能理解其背后对政治权力斗争异化亲情的批判,同时也能把握该事件在宗法秩序中的史学定位。

以上这一案例表明,《左传》地方性知识的认知结构具有三位一体的特征,即文学是表达的载体,哲学是价值的内核,史学是制度的依托。任何译本若仅侧重单一维度,必然导致知识的残缺,因此,对《左传》英译本的相应研究也应该以知识为枢纽,对原文本中知识的三重属性进行协同解读与转换分析,方能在认知维度实现从知识片段的传递上升至体系的通达,从而真正突破文本的认知锁定。

2.2 以“知识”为引领应用多元技术

传统翻译研究以纸质文本为核心对象,侧重使用定性分析来解读翻译现象与影响因素,但研究者的主观偏好、个案的特殊性等因素容易导致研究的偏差,影响结论的客观性(邹常勇, 2020: 125)。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部署推动翻译研究向数字化、智能化升级(陈钰, 2023: 101),基于大规模语料考察与数据分析的研究范式,凭借其客观性与科学性成为翻译研究的新方向(胡开宝等, 2022: 116)。

数字化定量分析已在部分典籍英译研究中得到实践(王赞等, 2020; 薛冰等, 2020)。耿强(2022: 81)指出,利用数字人文手段实现历史文本数字化,可将不可检索的文献转化为可分析的资源,提取其隐藏的知识并生成新知识,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翻译实践。但是定量技术并非对传统研究的替代。张威等(2023: 102)已发现,当前量化翻译研究存在数据归因分析不系统、理论阐释不充分等问题,易陷入“从数据中来,到数据中去”的困境。因此,定量技术与经典理论应该互为补充。

将文献数字化与数据化作为重要研究对象(耿强, 2022: 81),既能为数据分析提供理论支撑以消解量化局限,避免形成新的技术锁定,又能通过多元技术融合建构新研究范式,为规则突破奠定基础。知识翻译学以“知识”为核心方法论(孟祥春, 2022: 58),以“知识”为引领的《左传》英译研究,应超越传统的译文对比与策略分析,构建“知识梳理—技术赋

能—效果验证”的多元技术融合体系,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推进:

第一,构建“语言+知识”的双维度平行语料库。基于《左传》知识体系,构建涵盖原文、各英译本及相关评注的汉英平行语料库。在语料库中,不仅标注词汇、句法等语言层面的信息,更重点标注历史事件、人物关系、制度术语等知识层面的信息。《左传》英译研究者借助语料库检索与统计功能,可精准定位不同知识维度在各译本中的翻译异同。以《左传》中的核心伦理知识“礼”为例,通过检索语料库可梳理“ritual”“propriety”“ceremony”等英译的使用场景,结合知识语境分析其在译语文化中的传递效果;动态更新的语料库还可实时纳入新译本与研究成果,实现知识积累的持续迭代。

第二,运用文本挖掘技术解析知识的传递规律。聚焦两大核心方向:一是《左传》知识在英译本中传递的完整性分析,通过 LDA 主题模型等方法对比原文与译文的主题分布,识别历史知识、伦理知识等维度的传递缺失或偏差。例如,通过主题强度计算判断某译本对“宗法制度”主题的关注度的偏差,进而分析翻译策略的合理性。二是《左传》知识在译本中传递的接受度分析,通过挖掘国际读者评论、学术引用等数据,识别目标受众对译本所再现的《左传》原文的知识接受偏好。三是构建《左传》知识在英译本中传递的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实现翻译质量的动态监测,推动译本优化升级。

第三,依托可视化与多模态技术拓展研究维度。一方面,利用知识图谱实现系统性译本对比。如将理译本、胡译本、合译本对“秦晋崤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等关键事件的再现映射至同一知识网络,直观呈现各译本在人物关联、制度背景、因果链条等维度所覆盖的差异。另一方面,借助多模态技术探究《左传》知识的海外接受效果,针对译本的数字出版、教育平台等多元应用场景,通过交互日志、眼动追踪、用户访谈等方式,实证分析图文、音频、AR 等模态对《左传》中的复杂知识(如宗法继承、朝聘礼仪)在跨语传递中的协同作用。

综上,语料库与文本挖掘技术奠定《左传》知识跨语传播的分析基础,知识图谱实现译本系统对比,多模态技术支撑接受效果实证,三者“知识”引领下形成闭环的研究生态,推动《左传》英译研究从文本的表层分析深入到“知识跨文明再生”的理论研究领域。

2.3 以“知识”为起点建构多元研究规则

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推动中华文化真实有效“走出去”,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成为翻译研究必须直面的核心命题(刘云虹,2022:72)。《左传》英译研究需突破单向规则束缚,摆脱“悬浮式”的理论阐释,立足文化传播实践来构建多元研究规则。

知识的地方性与翻译的世界性,应成为研究的核心逻辑起点(王晶,2023:26)。人类创新活动与软知识(即默性知识)、交叉知识与实践知识息息相关(杨灿明,2022:5-7),而知识生产天然具有跨学科属性,需融合多学科理论、方法与工具(樊丽明等,2019:12)。跨学科研究通过借鉴融合不同学科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能够有效拓宽研究视野、深化认

知(穆雷等,2020:118)。翻译作为跨文化、跨语言的知识转移活动,本身就具有跨学科特质,其知识转移不仅涉及文本与语言层面,还涵盖组织、区域、媒介等多元维度(王广禄,2022)。因此,以“知识”为逻辑起点,建构多元、跨学科、实践导向的研究规则,是突破单向规则锁定的关键。

《左传》并非只是客观的历史记录,而是由隐性知识、交叉知识与实践知识构成的复杂的文明知识体系。如《郑伯克段于鄢》中“伯”字隐含的道德伦理属于默性知识,即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数字、图表、公式等方式表达传播的知识(杨灿明,2022:7);《医和论病》所融合的医学、天文及政治哲学属于交叉知识,即跨学科交叉、多学科融通的知识(杨灿明,2022:10);《振旅》所呈现的战争前军礼程序属于实践知识,即通过实践获取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和规律(杨灿明,2022:13)。目前对上述三类知识的译介研究仍受制于单一静态的文本内向型规则,未能将译本视为知识转化的结构性场域。但是译本对知识的不同处理并非只是单纯“译得好坏”的问题,有其内在的处理机制。唯有以“知识”为分类依据,建构差异化、跨学科、动态响应的研究规则,才能推动《左传》英译研究从“译本优劣论”上升至“知识跨文明再生”的时代命题。具体可从三方面推进:

第一,建立《左传》知识类型精细化识别与分类建模规则。构建适配《左传》的知识类型学框架,明确区分默性知识、交叉知识与实践知识,并设定三类知识在《左传》英译本中的差异化转码评估指标,如“默性知识显化度”“交叉知识互联性”“实践知识可操作性”等,使研究从经验判断转向结构化分析。

第二,推行跨学科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整合规则。针对《左传》中不同知识类型的英译,引入合适的理论阐释工具。如运用阐释学与副文本理论阐述原文本中默性知识伦理含义的英译;借助概念史方法追踪原文本中的“礼”等关键术语在英译中的语义迁移情况,结合制度史与考古成果考察实践知识在译本历史场景中的再现情况;融合数字人文技术,构建《左传》知识英译图谱、开发多模态《左传》英译注释平台、通过眼动实验等实证方法评估《左传》中的各类知识在译本中的传递效果,实现从静态文本分析到动态认知追踪的转型。

第三,构建《左传》英译传播场域的多模态延伸与实践反哺规则。将研究视野从纸质译本拓展至影视、教育、文创等多元媒介场景,例如,可将《左传》衍生的历史典故、文创产品等的英译纳入研究范畴,验证多模态组合的英译对《左传》知识传递的增效作用;并且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场景,推动研究成果落地,例如,基于相关研究,可与博物馆合作开发《左传》事件导览的英译,将《曹刿论战》战术逻辑可视化;与动画团队协作,用英语分镜语言呈现“郑伯克段”的宗法张力,通过“研究—应用—反馈—再研究”的闭环机制,实现理论

假设验证与翻译策略优化的双向赋能。

通过上述研究规则的重构,《左传》英译研究可实现从“语言对等”到“知识通达”、从“文本中心”到“认知生态”的转型,使翻译真正成为中华文明知识体系全球再生的有效通道。同时,以“知识”为核心的跨学科研究,还能助力翻译理论的完善突破,形成综合性整体性研究路径,彻底打破单向规则锁定。

3 结语

典籍英译研究作为兼具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的系统工程,其核心要义在于实现典籍所蕴含的“地方性知识”的世界化转译、传播与认同建构,而非单纯的文本语言转换。

当前《左传》英译研究已陷入文本认知、研究技术与单向规则的三重路径依赖困境,严重制约了研究的发展与实践价值的发挥。本文提出以知识翻译学理论为支撑,构建以“知识”为核心的路径突破体系。通过认知拓展重构文本解读维度,通过技术融合革新研究范式,通过规则重构形成实践导向的双向闭环。这一路径不仅能推动《左传》英译研究突破旧有束缚,进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升级、实践成果反哺理论完善”的良性循环,为同类历史典籍英译研究提供范式参考;更能助力《左传》所承载的中国特色地方性知识突破文化边界,实现与世界多元文明的深度对话互鉴,为增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学术支撑与实践动能。

参考文献:

- 陈慕华. 2006. 析《左传》英译的失与误[J]. 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 60-62, 114.
- 陈钰. 2023. 智媒化译介论[J]. 外国语(4): 100-107.
- 樊明明, 杨灿明, 马骁, 刘小兵, 杜泽逊. 新文科建设的路线与发展路径(笔谈)[J]. 中国高等教育(10): 10-13.
- 耿强. 2022. 从观念的旅行到知识翻译学: 一个谱系学的考察[J]. 当代外语研究(3): 74-83.
- 胡开宝, 王晓莉. 2022. 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 现状、问题与前景[J]. 外语与外语教学(6): 111-121, 148-149.
- 左丘明. 1997. 左传[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 蓝红军. 2022. 作为理论与方法的知识翻译学[J]. 当代外语研究(2): 34-44, 161.
- 李玉良(译). 2006. 《左传》名言[M]. 济南: 齐鲁书社.
- 林琳. 2012. 再现历史上的文化元素[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 刘云虹. 2022. 对话与共生——试析许钧关于中华文化译介的思考[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4): 72-80.
- 刘元春. 1999. 论路径依赖分析框架[J]. 教学与研究(1): 42-47, 80.
- 罗选民, 杨文地. 2012. 文化自觉与典籍英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5): 63-66.
- 孟祥春. 2022. “知识翻译学”命名与概念构建[J]. 当代外语研究(3): 55-64.

- 穆雷, 杨扬. 2020. 翻译学跨学科研究之路径[J]. 外国语文(6): 118-125.
- 潘文国. 2023. 翻译研究的新突破[J]. 外语电化教学(1): 7-10, 106.
- 曲婷. 2019. 翻译规范视角下理雅各《左传》英译本中军事术语翻译[D].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 时晓虹, 耿刚德, 李怀. 2014. “路径依赖”理论新解[J]. 经济学家(6): 53-64.
- 陶源. 2023. 华兹生《左传》英译本的叙事结构转换及对典籍英译的启示[J].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1): 199-210.
- 王琨双. 2005. 历史典籍中特殊文化因素的翻译策略——目的论对《左传》英译的启示[D].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 王赞, 张政. 2020. 翻译研究新路径[J]. 外语教学(2): 81-86.
- 王广禄. 2022. 翻译学呼应时代重大命题[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5-23(002).
- 王晶. 2023. 翻译与学科发展理论模型——基于知识翻译学的中国学科翻译史研究框架[J]. 当代外语研究(6): 20-29.
- 魏泓. 2024. 论中国史学典籍如何“走出去”“走进来”? ——以《史记》英译为例[J]. 中国文化研究(3): 150-159.
- 薛冰, 向明友. 2020. 数字人文视域下《论语》英译本的修辞对比研究[J]. 外语研究(4): 83-93.
- 薛凌. 2014. 利科叙事视角下理雅各《左传》译本中的“三重具象”[D]. 开封: 河南大学.
- 杨灿明. 2022. 知识与创新[J]. 新文科教育研究(3): 5-15, 141.
- 杨枫. 2021. 知识翻译学宣言[J]. 当代外语研究(5): 2, 27.
- 张保国. 2023. 知识翻译学的要素关系与跨国史路径[J]. 当代外语研究(5): 23-32.
- 张洁. 2006. 马悦然: 品味汉语的芬芳[J]. 人民论坛(3): 58-60.
- 张威, 雷璇. 2023. 翻译研究的数字人文“转向”: 现状及反思[J]. 中国翻译(2): 99-106.
- 周福娟. 2023. 汪榕培典籍英译的知识翻译学阐释[J]. 当代外语研究(6): 39-45.
- 邹常勇. 2020. 大数据视域下翻译学数字人文研究[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 123-129.
- Burton, W. 1989. *The Tso Chuan: Selections from China's Oldest Narrative History*[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avid, P. A. 1985.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 332-337.
- Durrant, S., Wai-yee Li & S. David. 2016. *Zuo Tradition: Commentary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Egan, R. 1977. Narratives in Tso Chuan[J].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 323-352.
- Frendin, S. 2016. Breaking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of Local Path Dependence: An Entrepreneurial Perspective [J].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3): 239-253.
- Gould, S. J. & N. Eldredge. 1972. Punctuated Equilibria: An Alternative to Phyletic Gradualism[J]. *Models in Paleobiology*: 82-115.
- Li, Wai-yee. 2007. *The Readability of the Pas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Legge, J. 2011.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In Five Volumes: *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M].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Mahoney, J. 2000.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J]. *Theory and Society*(2): 251-267.
-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ines, Yuri. 1997.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he Chunqiu Perio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peeches in the *Zuozhuan* as Source of Chunqiu Intellectual History[J]. *Early China*(22): 1-48.

Path Dependence and Breakthroughs in the Research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Historical Classic *Zuo Zhuan*

HUANG Qin DANG Liangjun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research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Zuo Zhuan* as its core subject.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Zuo Zhuan* has formed text cognitive lock-in, research technology lock-in, and one-way rule lock-in. These three types are mutually nested and restrictive, seriously hinder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research and the application of its practical value. Based on this, relying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ransknowletology,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path-breaking strategies: constructing a cognitive expansion system centered on “knowledge” to reconstruct the dimension of text interpretation,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diverse research technologies led by “knowledge” to innovate research paradigms and methods, and establishing leapfrogging research rules with “knowledge”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o form a two-way interactive closed loop of “theory-practice-theory”. The purpose is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path dependence, promote the research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Zuo Zhuan* into a virtuous cycle,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English translation similar historical classics, and facilitate the global construction of “local knowledg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research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Zuo Zhuan*; knowledge; cognitive expansi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leapfrogging research rules; path breakthroughs

责任编辑:陈宁